



我们的公公(浙江石门方言称祖父为公公,祖母为婆婆)丰子恺先生爱孩子是众所周知的,他不但对自己的孩子备加关心爱护,而且早年的漫画与文章经常取材于他的孩子们,他那很多脍炙人口的著名画作中充满着童真无邪,童趣盎然,洋溢着天伦之乐。1926年他在《给我的孩子们》一文中表示了对孩子的崇拜:“我在世间,永没有逢到像你们这样出肺肝相示的人。世间的人群结合,永没有像你们这样的彻底地真实而纯洁。”

与此同时,公公以敏锐的洞察力预料到孩子成年以后他们的关系会发生变化。1928年公公在《儿女》中写道:“他们成人以后我对他们怎样?现在自己也不能晓得,但可推知其一定与现在不同”,“世人以膝下有几儿女为幸福,希望以儿女永续其自我,我实在不解他们的心理。我以为为世间人与人的关系,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。”这是个非同寻常的观点,即使在二十一世纪今天的中国社会里,父母与成年儿女之间如朋友一般平等相处的关系恐怕还是不多见的。可见公公有多么独树一帜的见解啊!

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公公给我们讲爸爸从前的故事,也目睹了爸爸为公公晚年提供生活上和精神上的慰藉。如今回忆公公与爸爸的父子之情,我们深深体会到公公对爸爸的舐犊之情,他们的关系随着时间推移的变化,以及公公晚年与爸爸之间亲情以外如同朋友似的平等交流关系。

爸爸在公公婆婆的子女中排行老四,前面都是女孩,爸爸的外祖父欣喜之下为爸爸取名为“华瞻”。公公告诉我们,爸爸的外祖父特意说明“瞻”是丰足的意思,显然是提醒他要用心挣钱养家,这使那时默默无名、生活窘迫的公公感到了很大的压力。然而,公公依然追求对艺术的爱好,淡泊荣华富贵,因此爸爸的出生并没有立刻改善家中的经济情况,公公戏言此归罪于“华瞻”经常被入写错,以讹传讹,演变成了“华瞻”的缘故。其实天如人愿,爸爸出生后不久,公公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他的一幅漫画《人散后,一钩新月天如水》,这是他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,一代大师的艺术生涯就此发轫,家境从此渐渐好转起来。公公开玩笑说,毕竟外祖父取名有方,爸爸果然给全家带来了财运。

爸爸幼年跟随公公奔波谋生于上海、嘉兴、和桐乡等地之间,在家庭的温情中养成忠厚老实、与世无争的性格,更为公公所赏识,他的天真烂漫、富有想象力的童年成为公公绘画撰文常用的题材。《瞻瞻底车-脚踏车》《瞻瞻底车-黄包车》《爸爸不在家的时候》等画,与《华瞻的日记》和《给我的孩子们》等散文,都成为公公热爱儿童的代表作品,展现了公公为他的孩子们所提供的以玩耍和游戏为主的成长环境。

公公告诉我们,在他的儿女中爸爸小时候对各种事物的兴趣最浓厚,感受最强烈,求知欲最强,做事也最认真,研读《王云五大辞典》或玩起游戏来都废寝忘食,言谈之间流露出舐犊情深,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据爸爸告诉我们,抗战前在石门湾生活时,公公不但鼓励他从小读书识字,甚至还“贿赂”他识字,爸爸开始学看学生字典时,每查出一个字的部首,公公便给他一角钱,可见爸爸对学习的热情从小受到公公的称赞和勉励。爸爸对他热衷的事情如此的投入和投入,后来我们在他对复旦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还能看到,爸爸这样认真、热情、刻苦的求知态度无疑是公公教育和培养的结果,真可谓“有其父必有其子”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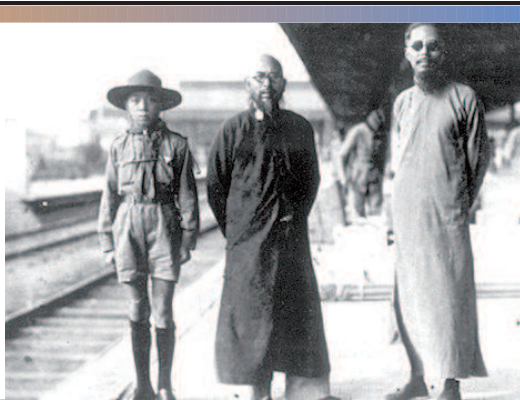
祖父丰子恺和父亲丰华瞻

丰南颖 丰意青

▼ 公公笔下被写生的三岁的爸爸



■ 1956年,公公(右)与爸爸(左)在上海的公园里合影



■ 1937年公公(右)与爸爸(左)和友人张善子(中)在南京车站合影

爸爸学龄期间正值抗日战争纷飞,一家老小辗转逃难,他无法继续上学完成正规的教育,全靠公公的家庭教育才没有荒废学业。公公不但教爸爸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等经典著作,读唐诗宋词,还教他英文、几何和代数等课程,因此爸爸的启蒙和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大多来自于公公。公公曾得意地告诉我们,爸爸得以考入当时大师云集,不但在亚洲,在全球也名列前茅的中央大学,是由于他教子有方,爸爸可是公公亲自教育出来的“学霸”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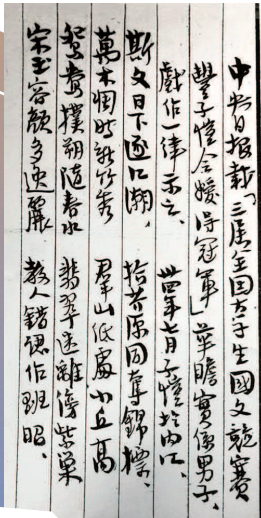
爸爸当时虽然主攻英文,国文也非常出色,他曾参加全国大学生学业竞赛得了国文冠军。《中央日报》误报“丰子恺令媛获国文冠军”成为笑柄,公公为这件事专门写过一首诗,字里行间,他由衷的高兴劲儿跃然纸上:

斯文日下逐江湖,拾芥原同夺锦标。
万木凋时新竹秀,群山低处小丘高。
鸳鸯扑朔随春水,翡翠迷离傍紫巢。
宋玉容颜多逸丽,教人错认作班昭。

早在1943年公公便意识到爸爸对文学的热爱和萌芽中的文学才华,预感到爸爸今后在文学上会有所作为,写下《寄长子华瞻》一诗以志勉励如下:

忆汝初龄日,兼承两代怜。昼衔牛奶媯,夜抱马车眠。
渐免流离苦,欣逢弱冠年。童心但勿失,乐土即文坛。

自幼承公庭训并不断受公公鼓励的爸爸,果然没有辜负慈父的期望,后来在文坛上尤其在翻译和比较文学领域颇有建树。我们可以看到,在公公与青少年时期的爸爸之间,父子之情上又增添了一份师生之情,公公不仅将爸爸培养成为一个“学霸”,并为爸爸打开了通往绚丽的文学世界的大门。



▲ 1945年公公为《中央日报》误报“丰子恺令媛获国文冠军”所题的诗

当年公公逃难到重庆后找不到房子住,在沙坪坝的荒凉之处建造了一幢“抗建式”平房。我们听公公说过那所房子十分简陋,墙壁是便宜的竹片上涂白土,远不及家乡的缘缘堂宽敞舒适,然而那是他们八年逃难流亡生活中最稳定的一段日子,他每天自由自在地读书作画,并以晚酌来慰劳白天的笔耕。在重庆上大学的爸爸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都回家,继续向公公学习古典诗词,并一起探讨诗词与学习作诗词。中国古典诗词从来是他们共同的爱好,也是他们父子之间多年来特殊的联结。

在公公多年的熏陶之下,也凭他自己对文学的天赋和爱好,爸爸

进入中老年后的公公,对于父母与成年儿女关系的看法一如既往。早在1948年公公便与诸子女约法,写明成年子女“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,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”、“子女独立之后,生活有余而供养父母,或父母生活有余而供给子女,皆属友谊性质,绝非义务”。

早在“文革”之前,爸爸凭他自己的辛勤努力,早已在事业上和经济上独立于公公。然而“文革”中在公公婆婆最困难的时期,爸爸来到了他们的身边陪伴他们、提供物质经济上以及精神上的大力支持,为他们遮风挡雨。为了保护公公他承受了言论上和体力上的屈辱,好让公公少担惊受怕,尽可能度过平静的晚年生活。爸爸这么做出于他的一颗“连一层纱布都不包”的赤子之心,以及他对父母纯真的爱。

爸爸也成为公公晚年讨论中国古典诗词、文学和外语问题的对象。我们除了看到他们常在一起谈论和欣赏诗词、填词作诗,或者用家乡石门话唱和诗词之外,还常看到他们在一起探讨日语翻译上的问题。爸爸虽以英语为专业,他与公公一样通晓几种外语包括日语,那时公公正在翻译《落洼物语》《竹取物语》和《伊势物语》,因而他们切磋琢磨日文较多。他们在磋商如何精确地翻译某一句话或是某一个词语时,各抒己见,认真斟酌,直到想出最为恰当的表达方式。他们父子俩做事认真,精益求精,对于已译好了的句子或词汇,事后还会不约而同地继续思考“这一句应该怎样翻译才能更好的忠于原著的意思?”有时我们看到数日之后,他们又重新回来切磋之前的同一个问题。晚上爸爸下班回来,公公总是与爸爸分享他日间想到的日文翻译问题,或是商讨新的日文词汇等。

公公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无疑对爸爸有巨大的影响,爸爸对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在复旦是众所周知的。复旦大学外文系1979年出版集体翻译的《1942-1946年的远东》一

书,共五十五万字,特别指定爸爸一人为此书作最后的校订定稿工作。共同的爱好和治学态度使公公当年与爸爸如同朋友般地平等交流,他们父子的关系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。

除了学术探讨之外,爸爸也常将在复旦听到的各种信息讲给公公听,共同分析“文革”新动向,帮助公公准备应付新情况。比如有一次爸爸听了上级报告后回家告诉公公,政策将有所改变,老年知识分子将作为内部问题处理,归还抄家物资,照发工资等。他们两人分析下来感觉到形势在往好的方向转变,公公听了精神振奋,告诉我们他觉得解放之日快到了。爸爸也从复旦给公公带来公公的老朋友的消息,比如赵景深教授、陈望道教授和苏步青教授,有时爸爸下班回到家会告诉公公“今天恰好碰到了某某人……”常年蛰居在家的公公,关心老友近况,也十分渴望听到外面的种种消息,这类交流也成为他们父子俩谈话的一个重要部分。

几十年下来,公公与爸爸的父子之情随着时间发生了演变和升华。爸爸幼年公公呵护钟爱的对象,青少年时期他承公庭训,在亲情上加上师生之情,爸爸成年后他们的亲情上又加上了亲密友谊,反映了公公的“我以为世间人与人的关系,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”这个想法。

公公晚年和爸爸如同朋友一般平等相处,在日月楼共同探讨问题的情景,仍时常浮现在我们的眼前,是我们终身难忘的记忆。如今公公和爸爸都已作古,一起安息在上海福寿园,公公有他心爱的瞻瞻像在有生之年一样陪伴着他,和他同游艺苑,体验诗情词味,继续切磋研讨学业,想必这对公公是个极大的安慰。亲情是生来具有的,可以融洽和谐,也可以成为扔不了、甩不脱的束缚,而友谊是自己选择的,不能强加,也无约束,因而更为难能可贵。公公早年对于父母与成年儿女关系之论具有深刻的洞察力,穿越时空仍在提醒我们深思如何看待和处理家庭和子女的关系。